



▲毛泽东、周恩来、赫尔利等在重庆九龙坡机场(资料图)

▲1945年8月28日,毛泽东亲赴重庆,与蒋介石国民政府谈判(资料图)

弥天大勇 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

在历史的转折关头,毛泽东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的襟情,置个人安危于不顾,毅然赴重庆谈判。最终,国共双方签署了著名的“双十协定”。

青砖白墙,小巷斜阳,走进位于渝中区化龙桥虎头岩的《新华日报》总馆旧址,80年前一群优秀报人在此发出的声声呐喊,仿佛能冲破时空,至今振聋发聩。

彼时的《新华日报》报道:“八月间充满了伟大的日子,伟大的新闻。本报发

表了毛泽东同志来渝的消息,重庆市民间是如何的激动,如何的洋溢着喜悦啊!本报门市部挤满打听消息的热心的读者。”

在历史的转折关头,毛泽东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的襟情,置个人安危于不顾,毅然赴重庆谈判。最终,国共双方签署了著名的“双十协定”。

这场艰难曲折的谈判,是一次民心向背的大较量,书写了中国共产党人浓墨重彩的辉煌篇章。

9天连发三封电报 蒋介石邀毛泽东赴渝

位于渝中区中山四路65号的桂园,是重庆谈判的旧址。

“当时虽然抗战的硝烟尚未散尽,但是内战的危机迫在眉睫。”在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二处处长黎余讲述中,记者参观了桂园主楼及“重庆谈判”专题展览。

展墙上,1945年5月,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大上作的政治总报告陈列其中。报告上写着“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,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,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”。

“回溯这段历史,还要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说起。”黎余说。

1945年5月,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,亚洲战场也胜利在望。同年8月6日,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;8日,苏联对日宣战,苏联红军挥师出兵东北;9日,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;15日,日本天皇裕仁广播“终战诏书”,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。

由此,日军投降后的接收与缴械问题,刻不容缓。而在这个时候,蒋介石的嫡系主力却偏处西南。

杜鲁门曾在回忆录中对当时蒋介石的处境作如是描述:“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,华南和华东仍被日军占领着,长江以北则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。”

毛泽东对此却洞若观火,胸有成竹。他在为中共中央写的《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军任务的决定》中明确指出:将来阶段,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,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,对付内战,其数量与规模,依情况决定。

“在这样的时局背景下,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,也为发动内战作准备,蒋介石9天时间连发三封电报,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,共同商讨‘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’。”黎余介绍。

第一封电报发于1945年8月14日。电文称:倭寇投降,世界永久和平局面,可期实现,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,亟待解决,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,共同商讨,事关国家大计,幸勿吝驾,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。

第二封电报发于1945年8月20日。电文称: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,悯怀人民之疾苦,共同戮力,从事建设。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,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,共定大计,则受益拜惠,岂仅个人而已哉!特再驰电奉邀,务恳惠诺为感。

第三封电报发于1945年8月23日。电文

称: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,均待与先生面商,时机迫切,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,则重要问题,方得迅速解决,国家前途实利赖之。兹已准备飞机迎迓,特再驰电速驾!

“从这三封电文中的‘不胜迫切’‘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’‘均待与先生面商’等字样,我们不难看出,蒋介石就是摆了一场‘顶庄舞剑,意在沛公’的鸿门宴。毛泽东如果不来,蒋介石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把‘不要和平’、挑起内战的罪名扣到共产党和毛泽东身上;来了,又无异于深入龙潭虎穴。”黎余说。

赫尔利以国格担保 斯大林两次促谈

“促使国共双方进行谈判的动力,不仅局限于国内的政治格局,更有其宽广的历史背景,与美国和苏联的利益紧密相关。”重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周勇说。

周勇对重庆谈判已研究40多年,写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。他称,1943年,美、英、中三国元首举行了开罗会议,就联合对日作战以及战后处置日本等问题,取得了共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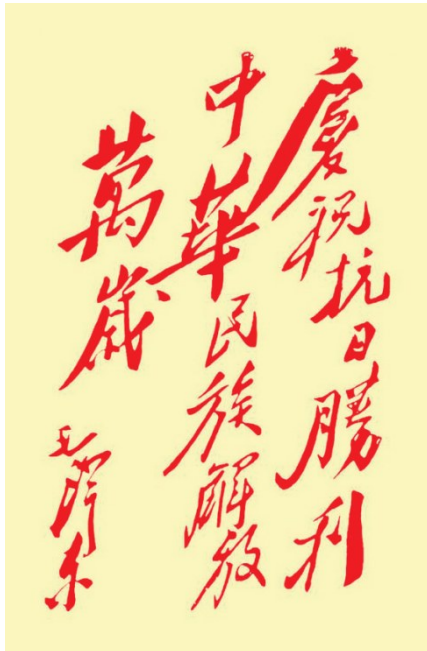
在此背景下,美国对中国因国共纷争,而削弱对日作战的力量,感到非常担忧。为此,美国对中国的策略是,要对国共两党劝和、促谈、改组政府——成立联合政府,从而实现国共两党共同抗战,牵制住日本,既缓解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,加速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到来,又保证在战后中国不至于爆发内战,更要防止中国不至于倒向苏联。

“为此,1944年8月,美国罗斯福总统与马歇尔将军决定派遣赫尔利前往中国,调解国共谈判,以及协调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关系。赫尔利先是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,后继任了美国驻华大使。”周勇说。

赫尔利来华后,于1944年11月7日飞到延安,和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先后进行了四轮会谈,力促国共军事力量的统一。其中,在11月9日、10日的会谈中,赫尔利与毛泽东就下一步举行“毛蒋重庆谈判”,进行了充分的讨论,力争形成国、共、美三方共识。

赫尔利表示,“我此次能同毛主席一起工作,实为平生快事。尤其令我庆幸的是,中国人民有了这样一位大公无私、一心为人民谋福利的领袖”。

他更是代表美国政府作出郑重承诺:一是蒋介石如愿见毛泽东,他将陪同毛前往重庆;二是如果毛泽东愿意见蒋,将成为美国的上宾,“以美国国格担保毛主席及其随员在会后能安全地返回延安,不管会议的成效如何”;三是毛



▲《新华日报》发表的毛泽东主席为庆祝抗战胜利的题词(资料图)

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前往重庆,均由美国提供飞机运输。

“除了美国,苏联对中国局势的影响同样较大。”周勇称,斯大林一直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,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,甚至认为战后的中国,只能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,只能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来实现中国的统一。中国共产党必须妥协,建立以蒋介石为领袖的联合政府,方能避免内战。

1945年8月14日,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》签订,苏联公开其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态度。

“为了维护苏联的利益,1945年8月16日、18日,斯大林两次发电报给中共中央,希望和平解决中国国内争端,避免内战。”周勇说。

斯大林在电报中明确表态,支持毛泽东去重庆谈判,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,走和平发展的道路,否则一旦打起内战,“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”。

斯大林还说,中共的武装斗争是没有前途的,应该同蒋介石达成协议,解散军队,加入国民政府。

弥天大勇 挥手之间扭转乾坤

风雨如晦,君子何畏。

“面对国民党咄咄逼人的态势,以及美、苏的促谈,在中国面临两种命运、两个前途抉择的关键时刻,中共中央政治局连日召开会议,进行广泛的讨论。”周勇介绍。

1945年8月23日,毛泽东在延安枣园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,郑重表态:“我是否去重庆?还是出去。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、书记处决定。”

次日,毛泽东回复蒋介石:“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,商讨和平建国大计。俟飞机到,恩来同

志立即赴渝晋谒。弟亦准备随即赴渝。”

“由于事关重大,当时一些解放区领导人向中共中央发电报,反对毛泽东亲赴重庆。1945年8月25日、26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又继续开会,讨论了解决这个问题。”周勇说。

最终,为了国内和平、民主、团结的实现,毛泽东毅然决定,接受蒋介石的邀请,赴渝谈判。

他认为,“去,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。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,但签字之手在我。”“由于有我们的力量、全国的人心、蒋介石自己的困难、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,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。”

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,毛泽东还曾说:“我准备坐班房……如果是软禁,那也不用怕,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。现在苏联红军不入关,美国军队不登陆,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,实际上是三国过问,三国都不愿中国打内战,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。中苏条约有利于中国人民,苏联红军攻占东三省是有很大影响的。所以,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。”

毛泽东的发言,一锤定音。于是,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,由周恩来、王若飞陪同毛泽东,前往重庆进行谈判。

“毛泽东还做了最坏的打算,他向中央建议,他离开延安期间,由刘少奇代理主席职务;中共中央书记处增补陈云、彭真为候补书记,以便在他和周恩来都不在的情况下,书记处能正常运转、高效决策,指挥全党继续奋斗。”周勇说。

“待望的人终于到了!机门才开,就是一片鼓掌的声音。最前列就排齐了几十位摄影记者的阵势。毛泽东!坚强地领导着中国人民为抗战、团结和民主而斗争的人,就站在大家前面了!”这是《新华日报》报道毛泽东到达重庆时的情景。

1945年8月28日,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、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,乘飞机到达重庆,受到各界热烈欢迎,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。

《新华日报》还记载,在机场,“人们在酷热中等候了两个钟头,但是每个人都遮掩不住由衷而发的喜色……”

《大公报》将“毛泽东先生翩然到渝”与“日本投降,抗战胜利”“中苏定约,结为盟好”并列为国家的喜事。

毛泽东在机场发表了演说,鲜明地表达了态度:“目前最迫切者,为保证国内和平,实施民主政治,巩固国内团结。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,应在和平、民主、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,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,建设独立、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。”

爱国诗人柳亚子写诗称赞,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是“弥天大勇”。

“在历史的转折关头,毛泽东毅然赴重庆谈判,这是为国家民族而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壮举,体现了人民领袖始终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的襟情,体现了敢于斗争、善于斗争的大智大勇。80年来,其光芒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,激励我们在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,更加坚定自信地走向未来。”周勇说。

据重庆日报